

国外学界关于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评析*

刘曙辉

内容提要 新冠疫苗是抗击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最有效的武器,而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却奉行“以我为先”的疫苗民族主义,严重阻碍全球抗疫成功的进程。国外学界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们从解释疫苗民族主义的定义入手,分析了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影响、成因与本质。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公共卫生和道德方面提出了反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论据,并提出了扩大全球疫苗供应、畅通全球疫苗供应链、确保全球疫苗分配的公平性等应对策略。国外学界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是较为深入的,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大多是可行的,为抵制西方疫苗民族主义、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借鉴。其批判性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一是关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条件性这一立场削弱了其批判的力度;二是没有明确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因而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其根源,从而削弱了其应对策略的有效性。

关键词 新冠疫情 疫苗民族主义 全球公共产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大流行显示出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以及脆弱性,面对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新冠疫苗是抗击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最有效的武器,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提高全球疫苗接种率,并辅以其他有效手段,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然而,根据全球疫苗公平仪表盘(Global Dashboard for Vaccine Equity)的数据,截至2022年11月30日,高收入国家中72.8%的人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低收入国家中只有28.31%的人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①为何会出现如此悬殊的接种率差距?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疫苗接种费用的差距。高收入国家将其卫生保健支出平均增加0.8%,就可以支付70%人口的疫苗接种费用;而低收入国家必须将其卫生保健支出平均增加56.6%,才能支付70%人口的疫苗接种费用。^②无论是疫苗接种率的差距,还是疫苗接种费用的差距,都与一些发达国家奉行疫苗民族主义的做法密不可分。为了消除“疫苗鸿沟”、促进疫苗公平可及可负担、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内外都在抵制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在此过程中,国外学界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 本文为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22AKS006)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审稿专家和《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Global Dashboard for Vaccine Equity, <https://data.undp.org/vaccine-equity/>, 2022-12-4

② Global Dashboard for Vaccine Equity, <https://data.undp.org/vaccine-equity/>, 2022-12-4

一、何谓疫苗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通常涉及出于经济原因或安全原因等将单个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当富裕国家的政府争先恐后地与制药公司直接签署交易,确保为自己的人口提供新冠疫苗,从而限制其他人可用的库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这种“以我为先的方法”描述为“疫苗民族主义”。

全球新冠疫情下的疫苗民族主义既不是新鲜事物,也不是最后一次,而是一种惯常的做法。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形。澳大利亚作为第一个研发出疫苗的国家,阻止疫苗出口,而一些富裕国家则与几家制药公司签订了预购协议,仅美国就获得了购买60万剂疫苗的权利。在此之前,只有在发达国家确保有足够的库存满足国内需求后,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在同样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猴痘疫情下,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采购猴痘疫苗,却未打算与非洲分享疫苗。

森朱蒂·萨哈(Senjuti Saha)等人在《英国医学杂志》出版集团旗下《全球卫生》期刊发表《新浪潮新变种与旧的不平等——持续的新冠疫情危机》一文,指出:“疫苗民族主义的例子不是一次性案例,而是遵循高收入国家设定的道路,他们与制造商进行独家交易并垄断供应链,以拥有足够的疫苗数量为其人口多次接种。”^①考虑到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以及新冠疫苗在战胜疫情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疫苗民族主义成为关注焦点再自然不过了。

国外学界对疫苗民族主义的定义大同小异。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在《新冠疫情和疫苗民族主义的代价》报告中指出:各国努力争取最先获得疫苗供应并囤积疫苗生产的关键投入的情况通常被称为“疫苗民族主义”^②。2021年6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杂志》第98卷第3期推出“疫苗与免疫”专刊,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全球卫生办公室普拉纳夫·坦顿(Pranav Tandon)在《新冠疫苗全球不公平分配的伦理、公共卫生和经济维度》一文中,将部分国家过多地储存疫苗称为疫苗民族主义。^③

波兰科兹明斯基大学副教授、匈牙利社会科学中心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卢卡斯·格鲁什琴斯基(Lukasz Gruszczynski)等人在《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之间:应付新冠疫苗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疫苗民族主义是由公共卫生专家创造的一个流行词,用来描述政府采取单边行动让本国民众先于其他国家民众获得疫苗的情况。^④曾任印度细胞和分子生物学中心主任级科学家的古普塔(P. D. Gupta),在《新冠疫苗: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一文中指出,当一个国家设法为本国公民或居民确保疫苗剂量,并在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之前优先考虑本国市场时,这种做法就被称为疫苗民族主义。^⑤巴基斯坦旁遮普医学院梅尔·M. A. 里亚兹(Mehr Muhammad Adeel Riaz)等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疫苗民族主义的全球影响》一文中指出,疫苗民族主义是一种旨在从制造商那里囤积疫苗并增加本国供应的经济战略,其目的是尽快为本国储备和接种疫苗,而不管疫苗制造商

^① Senjuti Saha, et al., “New Waves, New Variants, Old Inequity: A Continuing COVID-19 Crisis”, *BMJ Global Health*, 2021, <https://gh.bmj.com/content/bmjgh/6/8/e007031.full.pdf>

^② Marco Hafner, Erez Yerushalmi, Clement Fays, Eliane Dufresne & Christian van Stolk, *COVID-19 and the Cost of Vaccine Nationalism*,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769-1.html

^③ Pranav Tandon, “Ethical, Public health,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the Inequitabl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Vaccin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Medical Journal*, vol. 98, no. 3, 2021.

^④ Lukasz Gruszczynski, et al., “Between the High Ideals and Reality: Managing COVID-19 Vaccine Nation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vol. 12, no. 3, 2021.

^⑤ P. D. Gupta, “Corona Vaccine: Nationalism vs. Cosmopolitanism”, *Journal of Cell and Tissue Research*, vol. 21, no. 1, 2021.

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分配是否受限。^①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取得了显而易见的短期效应。卢卡斯·格鲁什琴斯基等人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对其短期效应进行了分析。^② 首先,政治效应。它可以通过取悦因经济和社会长期动荡而沮丧的选民,在政治上帮助政府。这反过来可能会提高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率。其次,经济效应。这一战略可以加快国民经济的重新开放。政府可以放松现有的卫生健康限制,从而支持经济复苏,减轻公共财政负担。最后,外交效应。疫苗可以作为一国外交策略的一部分在战略上使用。这些明显的短期效应使得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无视全球新冠疫情的严重性和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的无助无力。

二、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影响、成因与本质

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是整个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有各国愿意并且共同努力,才能战胜这一挑战。西方疫苗民族主义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在新冠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自私的做法,对全球公共卫生、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入分析其成因和本质,有助于消除西方疫苗民族主义。

(一) 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影响

新冠疫情是一场重大的复杂性危机,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加剧并延长了这场危机。国外学界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影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影响

首先,增加病毒进一步变异的风险、延长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时间。早在2021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表示,让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接种疫苗,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疾病和死亡以及持续封锁的痛苦,而且随着新冠疫情继续在未受保护的人群中传播,还会产生新的病毒变异。新冠疫情自暴发以来,已经出现了多种变异毒株。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将5种新冠病毒变种列为“需要关注”的变种,分别是:最早在英国发现的阿尔法(Alpha)、南非发现的贝塔(Beta)、巴西发现的伽马(Gamma)、印度发现的德尔塔(Delta)以及南非发现的奥密克戎(Omicron)。“这些变种凸显了社会未能快速、公平地接种疫苗的威胁,也是对可能开始传播的各种新冠变异毒株的预示。这些变种所带来的威胁应被视为一个教训,因为新型毒株的重新出现可能会延长全球大流行的时间。”^③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A. 赖纳特(Kenneth A. Reinert)在《疫苗民族主义与世界贸易组织》一文中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始终是病毒变异能力与人类开发、生产和分配疫苗能力之间的竞赛。鉴于病毒变异相当快,这是一场很难获胜的比赛。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清楚地表明,竞赛仍在继续,疫苗民族主义使获胜变得更加困难。”^④

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治理学院姆祖基西·乔博亚(Mzukisi Qoboa)等人在《非洲安全》杂

^① Mehr Muhammad Adeel Riaz, Unaiza Ahmad, Anmol Mohan, Ana Carla dos Santos Costa, Hiba Khan, Maryam Salma Babar, Mohammad Mehedi Hasan, Mohammad Yasir Essar & Ahsan Zil-E-Ali, “Global Impact Of Vaccine Nationalism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Tropical Medicine and Health*, vol. 49, 2021, <https://doi.org/10.1186/s41182-021-00394-0>

^② Lukasz Gruszczynski, et al., “Between the High Ideals and Reality: Managing COVID-19 Vaccine Nation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vol. 12, no. 3, 2021.

^③ Pranav Tandon, “Ethical, PublicHealth,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the Inequitabl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Vaccin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Medical Journal*, vol. 98, no. 3, 2021.

^④ Kenneth A. Reinert, “Vaccine Nationalism and the WTO”,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85533-vaccine-nationalism-and-the-wto/>

志发表《全球疫苗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指出:“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加剧了大流行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混乱,而且增加了大流行延长的风险,因为无法获得疫苗的发展中国家将难以及时为其人口接种疫苗,这反过来可能会为出现更多病毒突变提供空间。”^①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专门开设“新冠疫情”博客,伦敦经济学院丽贝卡·福曼(Rebecca Forman)等人指出,以我为先的疫苗民族主义使危险的新冠病毒新变种更有可能扩散。如果任由病毒蔓延和变异而不加控制,其影响可能更加严重。一些变种对目前的疫苗反应较差:在现阶段,由于中低收入国家缺乏快速公平的疫苗使用,可能造成的全球损害是无法量化的。这种短期行为可能会导致长期为抗击新冠病毒而努力、为应对新变种而无休止地接种疫苗,这对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都将极其昂贵。^②

其次,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健康不平等。西方疫苗民族主义使得疫苗不平等转化为健康不平等,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的《创新与不平等:2021年目标守护者报告》指出:健康不平等的问题从卫生系统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但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才真正让世界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的严重后果。一些国家获得了本国人口所需剂量两到三倍的疫苗,以备针对传染性更高的变异病毒进行疫苗补种。与此同时,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量还不到全球的1%。非洲大陆整体人口数量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30倍以上,但2021年上半年它们已经接种的疫苗剂量基本相同。^③

2.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首先,国外智库分析或预测了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给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2020年10月,美国兰德公司在《新冠疫情与疫苗民族主义的成本》报告中指出:如果没有疫苗,与新冠疫情及其经济影响相关的全球成本可能达到每年3.4万亿美元。疫苗民族主义可能使全球经济的GDP损失达到每年1.2万亿美元。如果最贫穷的国家无法获得疫苗,世界每年的GDP仍可能损失600亿—3400亿美元。^④2021年1月,国际商会(ICC)研究基金会委托土耳其科克大学杰姆·卡克马克里(Cem Çakmaklı)等人进行了一项《全球疫苗接种的经济理由:一个具有国际生产网络的流行病学模型》的研究。研究发现,如果各国政府不能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新冠疫苗,全球经济将损失多达9.2万亿美元,其中一半的损失将落在发达国家身上。^⑤2021年8月,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疫苗不平等会造成多大损失》报告中预测,到2022年中期无法为60%的人口接种疫苗的国家将在2022—2025年期间损失2.3万亿美元,新兴国家将承担其中2/3的损失,进一步推迟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融合。^⑥

其次,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将对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持久的影响,阻碍

① Mzukisi Qobo, Mills Soko & Matlala Setlhalogi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Vaccine Nationalism: Towards Building Agency for Africa’s Drug Manufacturing Capacity”, *African Security*, 2021, <https://doi.org/10.1080/19392206.2021.2009099>

② Rebecca Forman, Michael Anderson & Elias Mossialos, “Me-first Vaccine Nationalism Makes the Spread of Dangerous New COVID Variants More Likely”, LSE COVID-19 Blog, <https://blogs.lse.ac.uk/covid19/2021/03/11/me-first-vaccine-nationalism-makes-the-spread-of-dangerous-new-covid-variants-more-likely/>

③ 《创新与不平等:2021年目标守护者报告》, https://www.gatesfoundation.org/goalkeepers/downloads/2021-report/2021-goalkeepers-report_ch.pdf

④ Marco Hafner, Erez Yerushalmi, Clement Fays, Eliane Dufresne & Christian Van Stolk, “COVID-19 and The Cost of Vaccine Nationalism”,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769-1.html

⑤ Cem Çakmaklı, Selva Demiralp, Sebnem Kalemli-Özcan, Sevcan Yeşiltaş & Muhammed A. Yıldırım “The Economic Case for Global Vaccinations: An Epidemiological Model wit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https://icwbo.org/publication/the-economic-case-for-global-vaccinations/>

⑥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How Much Will Vaccine Inequity Cost?”, <https://www.eiu.com/n/campaigns/how-much-will-vaccine-inequity-cost/>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进展。202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美国丹佛大学帕迪国际期货中心合作撰写了《在新冠疫情重塑的世界中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报告。美国丹佛大学教授、帕迪国际期货中心创始人兼资深科学家巴里·B. 休斯(Barry B. Hughes)等人在报告中指出,新冠疫情发生一年后,国家之间的贫困差距将会扩大。到2030年,因新冠疫情陷入贫困的人中约有80%将生活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中非洲的负担最重。这个研究报告评估了“无新冠疫情”“新冠疫情”“高损害”这三种情况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到2030年,在“新冠疫情”情况下,将比“无新冠疫情”的情况多出4800万陷入贫困的人,而“高损害”情况会比“无新冠疫情”情况多出2.13亿陷入贫困的人。^①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的《创新与不平等:2021年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新冠疫情给很多人带来严重的、持续的经济影响。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与2019年相比,2020年全球又有3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到2022年,90%的发达经济体能将人均收入水平恢复到疫情前,而中低收入经济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占1/3。减贫工作停滞不前,这意味着全球预计有近7亿人口无法在2030年前摆脱极端贫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② 联合国《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23年完全恢复至疫情前预期水平,而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持续低于疫情前预期水平。^③

3.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国外学界认为,西方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加剧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加剧政治危机。但是,他们对这方面的分析较少,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将新冠疫苗当作世界政治博弈的工具,即把疫苗政治化,将自身利益置于新冠疫苗的全球公平获得之上,加剧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危机;另一方面,他们把疫苗作为外交工具来区分敌友,改善与盟国、邻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使疫苗出口和疫苗援助服务于其地缘战略目的,使国际政治重回权力政治。

(二) 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成因

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产生既有事实层面的原因,也有价值层面的原因。事实层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与疫苗研发、疫苗成本、疫苗生产和疫苗分配等因素相关。“疫苗民族主义既是由于疫苗供应短缺,又是因为提供疫苗的成本往往过高。这些因素则源于疫苗开发的独特性、涉及的经济激励、对专利保护的依赖以及商业秘密、隐性知识、测试数据和原材料在疫苗生产和分配中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④二是与全球卫生治理相关。病毒无国界,公共卫生需要全球采取及时有效的集体行动。正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卫生健康威胁,所以全球治理对于协调全球卫生对策是必要的。为了抵制疫苗民族主义,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疫情防控工具”(ACT-A)的倡议。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是其中专门针对疫苗的支柱,其建立是为了达成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联合预购协议。但是,无论是筹资,还是与制药公司签订合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都遭遇了困难。国际组织曾是全球卫生领域的中心,但现在一个更广阔的卫生

^① Barry B. Hughes, Taylor Hanna, Kaylin McNeil, David K. Bohl & Jonathan D. Moyer, *Pursu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 World Reshaped by COVID-19*, Denver, CO and New York, NY: Frederick S. Parde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utures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1.

^② 《创新与不平等:2021年目标守卫者报告》, https://www.gatesfoundation.org/goalkeepers/downloads/2021-report/2021-goalkkeepers-report_ch.pdf

^③ 《国际观察:始终不渝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促进者》,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7024372292310128&wfr=spider&for=pc>

^④ Orit Fischman-Afori, Miriam Marcowitz-Bitton & Emily Michiko Morris, “A Global Pandemic Remedy to Vaccine Nationalism”,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829419

生态系统已经崛起。该系统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具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学术界、名人、非政府组织、公私合营企业和慈善组织,^①这一全新的卫生生态系统为全球卫生治理增添了复杂性。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卫生治理的深刻裂痕:国际组织遭遇合法性危机,在应对共同威胁时面临来自民族主义政府的障碍;美国等实施孤立主义政策,削弱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阻碍联合国的协调反应,破坏了全球团结。^② 国际社会对新冠疫情的反应表明,全球卫生治理框架的有效性还有待提高。

从价值层面看,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出于自我利益。英国利兹大学全球治理讲师马库斯·弗劳恩多尔夫(Markus Fraundorfer)和欧洲研究高级讲师尼尔·温恩(Neil Winn)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后威斯特伐利亚卫生治理的出现——欧洲卫生联盟》一文中指出:“2020—2021年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应对表现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领土和主权的首要地位,这显著地恶化并延长了这场危机。跨国协调与合作的全球平台受到国家自身利益的制约。”^③

具体来说,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产生源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首先,在经济利益方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无视自身与发展中国的经济依赖性,为了避免经济损失和经济崩溃,最快地实现经济复苏,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而不是从公共卫生、伦理、科学和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待疫苗,故采取了疫苗民族主义的做法。

其次,在政治利益方面,英国伦敦大学全球健康教授特蕾莎·赫斯基(Therese Hesketh)指出:“因为每个人都受到大流行病的影响,而疫苗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控制大流行病是政治性的;控制措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从中完全恢复。”^④奥地利中欧大学艾琳·K.詹恩(Erin K. Jenne)在《新冠疫情时代民族主义的不同种类》一文中指出,从第一波感染开始,政府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国民经济,采购和管理疫苗,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感染、死亡和被封锁的经济损失。也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为国民提供集体防御以应对生存威胁。在新冠疫情中,被认为未能控制疫情的政府将面临丧失合法性的风险。为了防止出现合法性危机,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兴起,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相互竞争,率先研发出能够保护本国的疫苗,甚至挖走彼此的科学团队。^⑤ 正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优先关注,西方疫苗民族主义成为抗击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最大障碍。

(三) 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和根源

关于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和根源是什么,国外学界讨论较少。关于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俄罗斯科学院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斯坦丁·布洛欣(Konstantin Blokhin)指出,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美国例外论。^⑥ 他表示,当有可能使用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时,美国人的做法符合其通常的心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获取全球研发最顺利的疫苗的信息,以便随后买下整个科研团队,然后否认其他国家的贡献,宣称最好的疫苗都是美国的。美国人宣扬美国例外论,因此他

① Suerie Moon, et al., “The Global Health System: Lessons for a Stronge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PLoS Medicine*, vol. 7, no. 1, 2010.

② Lawrence O. Gostin, Suerie Moon and Benjamin Mason Meier, “Reimagini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COVID-19”,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110, no. 11, 2020.

③ Markus Fraundorfer & Neil Winn, “The Emergence of Post-Westphalian Health Governa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European Health Union”,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disa.12511>

④ Ruchira Sharma, “Why ‘Vaccine Nationalism’ Could Hinder the World’s Efforts to Combat Coronavirus”, <https://inews.co.uk/news/health/vaccine-nationalism-coronavirus-vaccination-covid-19-global-efforts-610214>

⑤ Erin K. Jenne,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Covid-19”,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50, no. 1, 2022.

⑥ “Russian Expert: ‘Vaccine Nationalism’ Exposes U. S. Selfishness”, <https://sputnikworld.blogspot.com/2020/09/russian-expert-vaccine-nationalism.html>

们的行为并不出人意料。

关于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根源,国外学界将其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乔·阿塔德(Joe Attard)在《疫苗民族主义:一种资本主义的混乱》一文中指出,疫苗民族主义的疯狂表明,一个基于私有财产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不具备应对病毒威胁的能力,病毒并不尊重边界、利润率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通过囤积疫苗和为疫苗争吵,最富有的国家使无数的生命面临危险,导致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该病毒继续在贫穷国家传播和变异,有可能出现更具传染性和更致命的新毒株。^①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议会议员萨马·萨旺特(Kshama Sawant)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只要有一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亿万富翁阶级、统治阶级以及代表富豪利益的政党就会成为建设人道社会的障碍。疫苗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下的一种常态,造成了“疫苗种族隔离”的情况。公共卫生专家发出警告,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大流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完全无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因为该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有关。要解决疫苗民族主义,需要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既需要从民族主义转变为国际主义,也需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②

关于西方疫苗民族主义,我们要明确它是民族主义在疫苗研发、生产与分配等过程中的体现,其本质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个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优先于其他个人或团体利益。既然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应该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去发掘其产生的根源。虽然国外学界没有准确把握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但能够将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显示出其批判的力度与深度。

三、反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论据

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将疫苗政治化,是民族主义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反映,是一种狭隘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疫苗不公平是世界结束新冠疫情大流行并从中恢复过来的最大障碍。从经济、流行病学和道德上来说,使用最新的可用数据向所有人提供挽救生命的疫苗符合所有国家的最大利益。”^③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到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对全球经济实际的或可能的影响,这些影响也是反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经济方面的论据,故这里不再赘述,而是主要探讨公共卫生方面和道德方面的论据。

(一) 公共卫生方面的论据

反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公共卫生论据主要来自流行病学。在新冠疫苗有限的情况下,公平公正有效地分发疫苗十分重要。2020年,美国东北大学网络科学研究所出版了《新冠疫苗分配合作策略与不合作策略的影响评估:一个模型研究》,马特奥·奇纳兹(Matteo Chinazzi)等人运用全球大都市疾病传播模型(Global Metapopulation Disease Transmission Model)研究了不同的新冠疫苗分配策略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在两种情况下,30亿剂疫苗被分配到世界各地。在不合作分配的情况下,20亿剂疫苗被一些高收入国家所垄断,10亿剂则平均分配到世界各地。在合作分配的情况下,30亿剂疫苗全部按人口比例分配给所有国家。为了避免关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未来进程不受控

^① Joe Attard, “Vaccine Nationalism: A Capitalist Disorder”, <https://www.socialistrevolution.org/vaccine-nationalism-a-capitalist-disorder/>

^② “Vaccine Nationalism Is a Norm Under Capitalism, the World Needs Internationalism”, <https://thewire.in/world/interview-vaccine-nationalism-capitalism-internationalism-kshama-sawant-socialist-us>

^③ “Vaccine Inequity Undermining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https://www.who.int/news/item/22-07-2021-vaccine-inequity-undermining-global-economic-recovery>

制的假设和未知情况,该研究还考虑了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分析如果疫苗在2020年3月16日就可以使用会发生什么。该模型考虑了单剂量疫苗,该疫苗在接种两周后就会生效。建模研究发现,到2020年9月1日,当疫苗有效率为80%时,合作策略和不合作策略将分别避免全球61%和33%的死亡,而当疫苗有效率为65%时,将避免全球57%和30%的死亡。^①从该研究可以看出,平均分配疫苗的合作策略可以比不合作策略避免27%左右的死亡。

(二)道德方面的论据

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事关每个人的健康权这一基本人权;疫苗民族主义侵犯人的道德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疫苗民族主义称为道德失败。普拉纳夫·坦顿在《新冠疫苗全球不公平分配的伦理、公共卫生和经济维度》一文中指出,虽然每个人都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医护人员因其职业性质而容易感染新冠病毒,因为他们为病人提供一线护理。同时,老年人(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面临最大的流行病学风险,因为他们最容易住院和死亡。无论其国家身份或资助疫苗研发生产的能力如何,医护人员和老年人都应首先获得新冠疫苗。因此,在国际层面拒绝向这些脆弱人群提供可用的安全有效的疫苗,而支持较富裕国家低优先级的人群,这在伦理上是有害的。^②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助理穆罕默德·扎希尔·阿巴斯(Muhammad Zaheer Abbas)在《疫苗民族主义的实际影响——应对新冠疫情的一种短视而又有风险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疫苗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私的方法,具有伦理意义,因为它往往剥夺了其他国家高危人群最值得的优先考虑,即使是为了富裕国家最不紧迫的需求。这种在道义上应受谴责的做法意味着,与南非的医生、加纳正在哺乳的母亲或尼日利亚患有肺结核的老年人相比,基本上没有感染的城镇中一个健壮的20岁美国人将获得更高的优先权。^③

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凯尔·弗格森(Kyle Ferguson)和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在《医学伦理学杂志》发表《在相互竞争的义务世界中分配疫苗》一文,将不公平的全球疫苗分配理解为疫苗民族主义与疫苗世界主义的伦理困境。疫苗民族主义秉承竞争、竞赛和资本的精神,疫苗世界主义具有协调、合作和团结的美德。他们认为,疫苗民族主义与疫苗世界主义是两种相互竞争的义务:疫苗民族主义是针对直接的、地缘政治定义的共同体成员,疫苗世界主义是针对人类共同体。根据他们的观点,在政治范围内优先为公民接种疫苗的伦理必须与在国际舞台上避免严重疾病和死亡的伦理进行比较。^④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妮科尔·哈松(Nicole Hassoun)在《医学伦理学杂志》发表《反对疫苗民族主义》一文,指出疫苗民族主义在伦理上是不合理的。没有人配得上他们出生时的运气,也很少有人能对他们的居住国有控制权。因此,当一些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每1200万人才有4台呼吸机,人们被埋在乱葬岗的纸箱里时,主张富裕国家可以把疫苗留给自己,可以先为其人民提供帮助,这是不合情理的。一方面,疫苗民族主义未能尊重基本人权和拥有这些权利的

^① Matteo Chinazzi, et al.,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ooperative versus Uncooperative Strategies of COVID-19 Vaccine Allocation: A Modeling Stud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Network Science Institute, <https://www.networkscienceinstitute.org/publications/estimating-the-effect-of-cooperative-versus-uncooperative-strategies-of-covid-19-vaccine-allocation-a-modeling-study>

^② Pranav Tandon, "Ethical, Public Health,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the Inequitabl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Vaccin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Medical Journal*, vol. 98, no. 3, 2021.

^③ Muhammad Zaheer Abb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Vaccine Nationalism': A Short-Sighted and Risky Approach in Response to COVID-19", <https://www.econstor.eu/handle/10419/232250>

^④ Kyle Ferguson & Arthur Caplan, "Love Thy Neighbour? Allocating Vaccines in a World of Competing Obligation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vol. 47, no. 12, 2021.

人。另一方面,富裕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压迫的历史导致全球贫困,并通过制定、维护和维持加剧而不是减轻全球贫困的强制性规则(例如国际贸易)而获利。^① 根据这两点可以推导出,富裕国家有义务向贫穷国家提供疫苗。在此基础上,她指出,凯尔·弗格森和亚瑟·卡普兰捍卫疫苗民族主义,但他们的论点只不过是同胞优先的认可。她将他们的论证重构如下:当我们属于一个民族国家时,我们就属于一个共同体,该共同体创造了为我们同胞的利益行事的(道德)理由。根据我们与他人的关联关系的性质,我们对全球共同体成员(或我们民族国家以外的人)的义务弱于我们对同胞的义务。据此得出结论:“在一个民族国家内,以自私自利的方式采购和分配疫苗是有正当的道德理由的。”接下来,她指出关联关系的性质并不足以决定我们对人类共同体成员的义务比对同胞的义务弱,因此没有正当的道德理由支持以自私自利的方式采购和分配疫苗。

四、针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应对策略

除分析疫苗民族主义的定义、影响、成因、本质和根源,以及从公共卫生和道德方面反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外,国外学界也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抗疫苗民族主义,实现疫苗平等?有别于疫苗民族主义的初衷是基于利益,这些应对策略则是基于正义,主要从坚持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扩大疫苗供应和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入手,具体如下。

(一) 坚持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

与疫苗民族主义将新冠疫苗视为市场商品和政治工具不同,反对疫苗民族主义的国外学者坚持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普里亚·乔伊(Priya Joi)在《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吗?》一文中指出,全球公共产品是一个经济理念。在卫生健康领域,这通常意味着对卫生健康真正有全球影响的方案、政策和服务,通常是积极的影响,即使这些收益或成本可能在世界各地并不公平。全球公共产品必须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消除疾病符合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标准,所以消除疾病作为一个整体是全球公共产品。但是,如果具体到疫苗,情况变得更复杂。疫苗往往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例如,如果价格定得很高,中低收入国家就负担不起。但是,排他性并非不可改变,社会政治决策可以对一种商品是私人物品还是公共产品产生影响。因此,疫苗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全球公共产品。^② 杰森·W. 尼克尔森(Jason W. Nickerson)和马修·赫尔德(Matthew Herder)在《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一文中指出,任何新冠疫苗都必须重新被定义为全球公共产品,而不是由政府补贴、私人控制的商品。之所以说新冠疫苗是“公共产品”,是指它虽然在形式上是物质的,但在本质上是基于信息的产品。也就是说,一旦掌握了某种疫苗对新冠病毒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知识,只有资源(如生产设施)和法律(如专利法)可以限制其消费。在没有这些限制的情况下,关于如何制造和使用这些疫苗的基本知识是无偿的和非排他性的。由于对新冠疫苗的需求,以及疫苗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国家或私人制造商能够单独保证疫苗的供应;相反,疫苗的开发和生产必然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因此疫苗被认定为“全球”公共产品。^③

(二) 扩大全球疫苗供应、畅通全球疫苗供应链

要在疫苗问题上做到公平分配,首先得解决疫苗的生产 and 流通问题。在思考如何扩大全球疫

^① Nicole Hassoun, “Against Vaccin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vol. 47, no. 11, 2021.

^② Priya Joi, “Are Vaccines a Global Public Good?”,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are-vaccines-global-public-good>

^③ Jason W. Nickerson & Matthew Herder, “COVID-19 Vaccines as Global Public Goods”, in Colleen M. Flood, et al. (eds.), *Vulnerable: The Law, Policy and Ethics of COVID-19*,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20, p. 593.

苗供应之前,国外学界分析了制约疫苗供应的因素。许多人认为,疫苗供应的制约因素是专利,因此呼吁实行新冠疫苗专利豁免。2020年10月,南非和印度率先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呼吁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以下简称为《知识产权协议》)的具体条款实施限时豁免,特别是涉及版权、工业设计、专利和未公开信息的条款。如果该提议获得通过,产品的供应量可能会增加,从而使全世界都能获得可负担的药物。^① 制药公司和一些政治领导人则强烈反对豁免提案。2021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疫苗供应的制约因素是生产能力和高质量标准,而不是专利。^② 经过争论,全球逐渐达成共识:只有促进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使不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及时掌握疫苗的制造技术和制造流程,增加疫苗产量,才能不断扩大全球疫苗供应。

疫苗供应链面临着严重中断的各种挑战,确定这些挑战及其优先顺序对于终结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至关重要。孟加拉国军事科技学院沙利亚尔·坦维尔·阿拉姆(Shahriar Tanvir Alam)等人在《新冠疫苗供应链所面临的挑战》一文中将决策试验和评估实验室法(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与直觉模糊集合(Intuitionistic Fuzzy Sets)理论相结合,探讨新冠疫苗供应链面临的关键挑战。其中,直觉模糊集合理论解决关键挑战的不确定性,而决策试验和评估实验室法解决新冠疫苗供应链关键挑战之间的交错因果关系。这项研究确定了15项挑战:疫苗接种成本和缺乏购买疫苗的财政支持、疫苗生产企业数量有限、缺乏准确的疫苗需求预测、消费者不愿接种、正面的疫苗营销不充分、疫苗仓库和接种地距离遥远、缺乏适当的计划和时间安排、采购前置时间增加、采购交付周期延长、缺乏适当的存储系统、难以监测和控制疫苗温度、难以追踪接种人群、与当地组织协调不当、缺乏疫苗监测机构、疫苗供应链成员之间缺乏关联性,揭示出“疫苗生产企业数量有限”“与当地组织协调不当”“缺乏疫苗监测机构”“难以监测和控制疫苗温度”以及“疫苗接种成本和缺乏购买疫苗的财政支持”是最关键的5项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全球应开展多边合作和全球合作,消除贸易壁垒和其他障碍,保持疫苗全球供应链和地区供应链畅通。

(三)完善相关国际法,确保全球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的公平公正

国际法能够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提供重要的规范保障,有助于解决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国外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完善国际法。

首先,着眼于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修订《国际卫生条例(2005)》。2023年2月25日,各国政府就更新《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未来方向达成一致,并就300多项拟议修正案举行第一轮集中讨论。拟议修正案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挑战,与抵制疫苗民族主义有关的修正案大致如下。^③ 一是在第一条“定义”中增加“卫生产品”。“卫生产品”包括疗法、疫苗、医疗器械、个人防护装备、诊断工具、辅助产品、基于细胞和基因的疗法,以及这些产品的成分、材料或元素,疫苗被纳入卫生产品的范围。二是新增第十三A条“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国际公共卫生应对”的内容,明确世界卫生组织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期间的国际公共卫生应对指导和协调机构,要求各缔

^① 世界贸易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于2021年6月12—17日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行,通过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部长决定》和《关于世贸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未来疫情应对准备的部长宣言》。文件中规定,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在有限的情况下制造和出口已获得专利的新冠疫苗,如果得到本国政府的批准,则无需征得专利持有人的同意。这为新冠疫苗知识产权问题提供了满意的答复,结束了围绕新冠疫苗专利权的争夺。这项针对知识产权的妥协措施,将提高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在新冠疫苗方面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参见:《南财快评: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掀开多边贸易体制新篇章》,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620/herald/4f1dc279e306bd00c20b8e2c7314fd18.html>

^② G. Chazan, E. Solomon, H. Kuchler & J. Brunsten, “Angela Merkel Rejects US Move to Waive Patents on Vaccines”, <https://www.ft.com/content/76a05a85-b83c-4e36-b04d-7f44f63e57b0>

^③ 《根据WHA75/(9)号决定(2022年)提交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拟议修正案》(逐条汇编), https://apps.who.int/gh/wgih/pdf_files/wgih2/A_WGHR2_7-ch.pdf

约国承诺在其国际公共卫生应对行动中采纳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对疫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进行评估,在供应短缺情况下制定疫苗分配计划,确定疫苗的接收者及其先后顺序,并确定所需的疫苗数量;有生产能力的缔约国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采取措施,通过生产多样化、技术转让和提高产能等方式扩大疫苗生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缔约国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确保其境内的制造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示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缔约国供应所需数量的疫苗,以确保分配计划的有效实施等。

另一方面,国外学界着眼于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冲突,确保疫苗全球分配的公平性。印度浦那共生法学院阿瓦尼·拉德(Avani Laad)指出:疫苗制造商的知识产权是实现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的一个障碍。根据《知识产权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必须遵守某些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最低标准。印度和南非关于新冠疫苗暂时豁免的提案基本上保证暂时放弃与新冠病毒感染预防和治疗所需材料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通过授予此类豁免,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将没有义务强制执行和保护与新冠药物、疫苗和设备有关的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此外,《知识产权协议》还规定了某些灵活性,可以在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使用。其中,第31条规定了专利材料的强制许可,如果出现国家紧急情况或极端紧急情况,成员国可以在未经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强制规定专利许可。此外,《知识产权协议》中增加了第31条的第二细则,允许向“制造能力不足或没有制造能力”的国家出口通过强制许可制造的产品。增加的这一点免除了出口成员国根据第31条(f)款承担的义务,否则这些义务仅允许他们在国内使用此类产品。^①

国外学界寻求从疫苗的属性、供应和分配方面应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这些策略基于正义的考虑,且偏重于分配正义。且不论疫苗供应是否充足,即使疫苗充足,谁具有决定疫苗分配的绝对权威?世界卫生组织能否胜任这一工作?在基于正义的策略无法充分应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情况下,我们还应该寻求基于团结的策略,包括疫苗援助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2年10月12日,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在联合国难民执委会第73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全力推动和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向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22亿剂疫苗。此外,我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定履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促进疫苗的公平合理分配,尤其是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分配,确保疫苗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可接受性和可负担性。

五、结 语

国外学界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是较为深入的,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大多是可行的,为抵制西方疫苗民族主义、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他们的批判性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

第一,关于疫苗的属性。疫苗是市场商品和政治工具还是全球公共产品,这是支持和反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争论的核心。出于利益考虑,支持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人坚持把疫苗当成市场商品和政治工具;为了抵制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国外学者应坚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遗憾的是,他们对疫苗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论述不多,而且还认为疫苗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关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条件性这一立场削弱了国外学界对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批判力度。2020年5月,我国率先提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只有坚持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属

^① Avani Laad, "Vaccine Nationalism, the TRIPS Waiver Proposal an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ttp://opiniojuris.org/2021/08/23/vaccine-nationalism-the-trips-waiver-proposal-and-public-international-law/>

性,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提高疫苗覆盖率,从而终结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从容应对未来疫情。

第二,关于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和根源。国外学者指出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美国例外论。无论是西方疫苗民族主义还是美国例外论,都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用一种意识形态解释另一种意识形态,反而遮蔽了两者同为意识形态的本质。一旦明确西方疫苗民族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接下来就需要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之进行分析。考虑到西方疫苗民族主义涉及的是全球政治经济领域,所以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经济学原理,既考察疫苗的研发和生产等供给侧,也考察疫苗分发分配等需求侧;既考察全球经济结构对造成全球免疫鸿沟的决定性作用,又考察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对疫苗不公的助推作用等因素。只有深刻把握西方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并从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分析其根源,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地有效抵制疫苗民族主义。

面对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我们应批判西方的疫苗民族主义,以此作为 21 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状况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现实检验,切实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Abstract COVID-19 vaccine is the most effective weapon to combat the global spread of the pandemic, but the “me-first” vaccine national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other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seriously hindered the successful global fight against COVID-19.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have made critical studies of Western vaccine nationalism.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vaccine nationalism, they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causes and essence of Western vaccine nationalism. On this basis, they put forward arguments against Western vaccine nationalism from the aspects of public health and morality,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expanding global vaccine supply, unblocking global vaccine supply chain and ensuring the fairness of global vaccine distribution. The critical studies of Western vaccine nationalism in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are relatively in-depth,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proposed are mostly feasible, which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resisting Western vaccine nationalism and jointly building a human health community. Nonetheless, there are two shortcomings found in their critical studies: first, their position on the conditionality of vaccin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 weakens their critique; second, they do not clarify the ideological nature of Western vaccine nationalism, therefore fail to analyze the root cause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hence under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ntermeasures proposed.

(刘曙辉,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于红]